中国城市百人论坛
CUF China Urban Forum 100

微 报

Micro Report

2014 年第 3 期（总第 3 期，9 月 5 日）

哪种城市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一）引言

不是所有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都有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不同理解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中央明确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地方政府要重新认识城镇化，由建设的城镇化转而考虑人的城镇化，中国需要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

关于中国的改革有一些不同看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做了一份报告，认为尽管改革会在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但至少在短期内，改革会使经济增长下滑。我们认为，有一些改革措施可能在短期内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很多改革措施，例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可以带来及时红利，可以较快的转化成经济增长百分点，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形成改革的激励兼容。在中央和地方，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形成共同的改革激励，凝聚改革的共识，坚定改革的决心。用改革带来的收益补偿在改革中有损失的当事人，推出成本分担机制和改革收益的分享机制。

（二）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减速，原因是什么？过去 30 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得益于人口红利，即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其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比重达 60%至 70%。资本积累与人口红利之间有什么关系？人口红利为物质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一，利于经济增长剩余转化成积累、储蓄，从而投资。中国长期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社会负担轻，成就了几十年来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其二，利于形成高资本回报率。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积累的资本有对应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合理，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所以中国过去一直资本回报率非常高。这两个因素支撑了过去 30 多年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的经济增长。

过去的十年发生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 2004 年首次出现的到劳动力短缺现象。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招工难一直是困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难题，而且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必然导致工资上涨。二是 2010 年出现了显著性的转折。中国 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 2010 年达到顶峰，此后，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在绝对减少。这两个转折点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再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也不再有资本报酬递增的现象。因此，考虑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因素，投资回报率即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以后，实际投资回报率已经显著下降了，过去几年非常明显。

此外，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投资回报率下降、生产率空间缩小等问题也会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在“十二五”规划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大约都是 10%；“十二五”规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7.6%，2013 年是 7.7%，今年是 7.5%；如果没有其他变化，潜在增长率还会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大概会降到 6.2%。未来想要重新拾起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前提是认识到这种潜在增长力的下降是应该接受的，接下来再考虑如何创造改革红利。

有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需求冲击导致的，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复苏乏力，而国内消费需求又因长期收入分配体制导致差距较大，因此认为投资率下降，显然是需求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确有一定程度的需求因素，今年 1-6 月份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已经在 5%以上，我们测算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概是 4.1%，如果实际失业率是 5.1%，就意味着还有一个百分点的周期性失业现象。而周期性失业是由需求方的冲击造成的，因此，我们也承认存在需求下滑导致增长速度下降，但更主要的还是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这是供给方的因素。观察中国主要类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发现

2004 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明显下降，这就意味者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源于需求方而是因为供给能力的下降导致的。

（三）创造改革红利

改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下降的趋势，应该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我们模拟了在重要领域实施改革后对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如果按照现有潜在增长率水平、按照过去的改革节奏推进，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是迅速下滑的，但是如果加入一些改革的假设，如提高教育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等（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其结果是改革可以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不同的改革假设可以有未来不同的潜在增长率。

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中国城镇化率现已达到 53%-54%，但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却仅有 35%-36%，两者之间的差值就在于农民工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的提供，教育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水平，提高劳动参与率；同时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亦可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入学水平，适度的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镇化是最为紧迫的改革任务和红利最明显的领域。

（四）结语

人的城镇化即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改革红利，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也有助于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消费需求稳定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从需求方保证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使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尽管需求因素不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但也是一种改革的红利。

最后，农民工市民化、人的城镇化可以带来总体上的改革收益。过去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进，让一部分人获益却不损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这种改进固然很好，但是我们的改革肯定要触动一些即得利益，可以考虑利用改革收益分摊改革成本，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推进人的城镇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收益。

（内容由论坛工作人员王雨飞根据演讲实录整理）